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20 期

120

何 东：金融对外开放如何促进效率与稳定

杨伟民：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

王缉思：世界政治趋势与中美关系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九年六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993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2007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年和2010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 149 期沙龙——何东先生题为“金融对外开放如何促进效率与稳定”的演讲，第 150 期沙龙——杨伟民先生题为“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演讲，第 151 期沙龙——王缉思先生题为“世界政治趋势与中美关系”的演讲。

在第 149 期沙龙，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何东先生作了题为“金融对外开放如何促进效率与稳定”的演讲。他认为，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并不要求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服务贸易的开放与某些资本流动限制可以是不相矛盾的。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外资参与水平较低，加快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能鼓励异质性竞争、增加服务提供商的多样性，促进技能和技术的转移、推动实施更好的风险管理实践，增加透明度和信息交换，从而提升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并为跨境资本流动的有序开放铺路。

在第 150 期沙龙，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先生作了题为“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演讲。他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两个维度，一是产业产品的高质量；二是空间的高质量，其中重点是城市化的高质量。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就是城市的经济、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均衡发展。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途径包括：第一，清晰定义城市；第二，放开户籍限制；第三，放开农村限制；第四，改革住房制度；第五，划清空间单元；第六，编制空间规划。

在第 151 期沙龙，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先生作了题为“世界政治趋势与中美关系”的演讲。他认为，中美关系短期不乐观，可能还会有很多事情出来，比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但短期内也不会坏得太快，目前两个国家元首还互称朋友，两国的做法还留有余地。这一次贸易协定没有谈成，接下来双方可能会沉寂一段时间。然后双方把打贸易战受到的损失、得到的利益，重新算一个帐，那时候重新谈成一个贸易

协定，还是有可能的。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分裂、技术分裂的后果太严重，会使得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反对分裂的力量出来说话。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交往频繁的现状难以逆转，“脱钩”长远来看不现实。国际上不可能出现中美分别牵头的两大营垒的对抗。美国现在的民粹主义和社会分裂，走到一定程度，可能也会有反弹。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何 东：金融对外开放如何促进效率与稳定	1
杨伟民：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	13
王缉思：世界政治趋势与中美关系	49

金融对外开放如何促进效率与稳定

何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49 期 2019 年 4 月 29 日

何东¹（IMF 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金融对外开放如何促进效率与稳定”，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理解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关系？如何理解竞争与稳定的关系？以及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的崛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给竞争和稳定政策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金融对外开放”到底是指什么呢？我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对这一概念做个界定。虽然目前还没有通用的定义，但可以认为，金融对外开放包含了以下两个部分：一是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二是资本账户的开放。

根据世贸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

¹此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

融服务贸易是指外国服务供应商给本国居民通过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人员流动等方式提供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意味着逐步消除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的限制。国民待遇要求国内外的企业在市场上处于相同的竞争条件之下。市场准入则要求制定合理的准入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包括对某些特定法律主体的限制，以及对外资参与和持股比例的限制。

资本账户的开放则意味着逐步移除一国居民和非居民之间开展金融资产交易的障碍。IMF的“机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和制度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或门槛，那么资本流动开放的好处多而风险少。然而，对长期以来采取广泛措施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来说，可以从进一步开放中获益，但完全开放不一定是在任何时期都是合理的一个目标。

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我接下来讨论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服务贸易之间的区别。“观察者往往未能认识到开放金融服务并不意味着自动开放资本账户，其结果是因为担心会对资本账户产生冲击而遏

制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河野和舒克内希特，2000，第 141 页）²。

GATS 中的金融服务协议对借贷和存款、证券发行和交易等不同部门（或活动）做了区分。根据不同的服务提供方式，金融服务贸易也可分为跨境提供服务和外国商业存在。GATS 鼓励渐进式的开放，且允许不同的金融服务部门和供给模式承诺不同程度的市场开放。

总的来说，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并不要求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换言之，服务贸易的开放与某些资本流动限制可以是不相矛盾的。这是因为不同的活动或交易模式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需求不同。跨境提供服务 and 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商业存在）相比，对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度的要求通常更高。

举例来说，假设美国的一家资管机构，比如说贝莱德，有意为中国投资者提供 ETF 产品购买服务。如果它想直接把在美发行的 ETF 产品卖给中国投资者，就需要中国投资者能将人民币自由兑换

²河野正道和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金融服务贸易如何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稳定？”，《金融服务的国际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由斯蒂恩·克雷森斯和马里昂·简森编辑，威科法律国际出版，2000 年。

为美元用以购买美股基金，即将人民币自由转换为境外组合投资。但如果贝莱德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让中国投资者购买本地发行的贝莱德 ETF 产品，只需要贝莱德能直接投资然后将其收益定期转换成美元汇出，而不需要人民币有较高程度的可兑换性以用来境外组合投资。

当然，如果中国希望能真正从金融服务贸易的逐步开放中获益，有序开放资本流动是必要的，但这两个进程的组合步调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外资参与水平较低，加快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能鼓励异质性竞争、增加服务提供商的多样性，促进技能和技术的转移、推动实施更好的风险管理实践，增加透明度和信息交换，从而提升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并为跨境资本流动的有序开放铺路。

目前为止有大量文献研究大规模、高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来增加金融系统的弹性。³ 这不在我

² 见“增强对大规模和高波动性跨境资本流动的弹性——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7月。

今天要讨论的范畴，我今天要讨论的是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对稳定性的影响，即增加金融服务业竞争和金融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在有效的审慎监管下，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⁴ 竞争带来优胜劣汰，是经济效率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金融服务业，前提是有良好的退出市场和倒闭机制。但金融业有其特殊性，金融业是一场信心游戏，金融体系比其他经济领域更脆弱，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竞争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银行业产品多样，由于重重壁垒和市场摩擦，银行业的竞争是不完全的。零售银行业中，客户转换成本、口碑、分支网络等都起到进入壁垒的作用。企业银行业中，现有业务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摩擦是导致面向中小企业的业务通常由区域性的本地银行提供。批发银行业和投资银行业中，竞争是国际性和市场导向的，即使市场高度集中，竞争仍然可以相当激烈。

由于存在行为偏差，金融体系内过度竞争可能

⁴夏维尔·威夫斯，银行业的竞争与稳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

会增加系统的脆弱性。例如，竞争市场上，借贷标准和风险筛选标准往往会降低，导致信用供应过剩，而消费者的过度借贷倾向，尤其是在风险偏好强烈且风险成本低下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过度竞争也可能会通过侵蚀现有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削弱监控贷款和维护长期客户关系的激励而加剧冒险行为。

因此，竞争和稳定之间很有可能呈现驼峰式非线性关系，适度竞争最有利于稳定（威夫斯，2016，第 227 页）。曲线一头从垄断市场开始，竞争水平的提升对应着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创新，因而是有利的。而当竞争水平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带来的好处和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达到平衡。超过这个平衡点后，竞争水平继续增加可能会对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很有可能还远低于竞争的最佳水平，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在 G20 经济体中处于倒数。但中国银行业某些方面似乎存在过度同质化的竞争，并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监管部门如何将竞争水平的增加纳入审慎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框架中？竞争和审慎政策如何协调？

减少进入壁垒、增加竞争性的竞争政策应该有更严格的审慎标准来配合（威夫斯，2016），竞争越激烈，资本充足率也应该更高。这是因为对资金的争夺会加剧投资者的协调问题，从而更容易出现挤兑现象，同时，特许权价值的降低也会诱使银行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因此，在开放金融市场、引进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的监管机构应该要求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扩大银行资本。

更广泛来说，过度竞争带来的一些顺周期问题有必要用宏观审慎工具纠正。例如，长期的房地产热潮可能会降低居民房贷的违约率，竞争会让发放房贷的机构低估遭遇房地产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审慎目标比竞争目标更为重要，审慎监管机构应当介入，为房贷风险权重设置一个下限。

接下讨论第三个问题：数字金融的崛起与资管市场发展给竞争和稳定政策带来哪些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一个案例

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个具体的例子。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美国以 Facebook、亚马逊、Netflix 和 Google 为代表，在中国以百度、阿里、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崛起，而全球资本市场则出现了大量以基准指数为指导的、由领航（Vanguard）这类资管巨头管理的投资。腾讯和领航有何共同之处？经济学家将腾讯的微信支付和领航管理的 ETF 产品称为“双面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平台”让买家和卖家得以互动，为来自不同群体的用户搭建互动的桥梁，比如消费者和商家是微信支付的两个用户群体。如果大部分商家愿意接受微信支付，那么消费者也会愿意使用微信支付。相反的，如果消费者愿意使用微信支付，商家也会乐意加盟微信支付。

ETF 的两个用户群体则是投资者和证券借入者，ETF 在分散的零售经纪和证券借入机构间搭建了桥梁。在 ETF 产品大受欢迎之前，托管机构无法将未得到零售投资者事先授权的股票借出去。当然，那时候零售投资者持有的股票规模相当小。现在，ETF 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追踪特定指数的一篮

子证券的标准化投资平台。由于 ETF 以极低的价格提供一篮子股票，购买单一个股的零售投资者转而投资 ETF，从而促进了零售股票的标准化。ETF 将这些股票集聚起来，以较大的规模向本来无法借入这些零散资产的机构客户借出。⁵

在这些双面市场中，市场通常高度集中。外溢性或网络效应，即用户从双面市场中的另一面获益，是造成市场高度集中的一大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规模效应，即用户越多，单位服务成本越低。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下，很容易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平台以极低的价格对市场的一面收取费用，吸引另一面的用户，后者为平台提供收益。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时无需付费，但加盟移动支付平台的商家需要支付手续费。投资者购买 ETF 产品只需支付极低的管理费，但资产经理人借出股票时会向借取者收费。

这属于掠夺性定价（即异常低的价格）还是滥用定价（即异常高的价格）？在市场的一面以低价

⁵杰西·布洛赫和罗伯特·惠利，“资管的双面市场：ETF 基金和证券借出”，未正式出版。

（甚至免费）提供商品或服务当然会招致反垄断机构的怀疑。在经典市场中，这类做法是削弱竞争对手的财力或释放出进攻信号，从而将其赶出市场的一种策略。相反的，高价则意味着拥有垄断势力。然而，在双面市场中，这一逻辑不一定成立。与过去相比，数字化时代的市场高度集中不一定代表着缺少竞争。针对双面市场的反垄断政策需要同时考虑市场的两面，在严格而细致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上，逐案判断是否存在垄断行为。⁶

金融服务的双面市场对金融稳定性有何影响？审慎监管机构是否需要担心移动支付和资管业的大型优势企业？从金融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否会成为“大而不倒”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在目前阶段，随着科技巨头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国际监管体系已经开始强调要监控和降低它们的操作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市场细分领域高度集中、借贷平台上的资金流动量达到高水平或变得不稳定，这些因素有可

⁶ 让·梯若尔，《公共利益经济学》，普林斯顿出版社，2017。

能导致科技巨头具备系统重要性和顺周期性。监管机构应定期评估稳定性风险，将功能的可比性，风险的水平和类型，以及这类经济活动的规模纳入考虑。⁷

在市场导向的金融行业中，ETF 的崛起让零售投资者可以负担得起组合投资，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金融稳定性风险。ETF 已经拓展到固定收益、信用、大宗商品等低流动性和低透明度的资产品类。ETF 供应商对股票借出的依赖，给交易对手风险和质押风险带来了新挑战。此外，在市场受到压力时，对按需流动性的预期可能会造成某些种类的 ETF 面临巨大的赎回压力，从而影响大型资管机构和银行的流动性。是什么推动了 ETF 等集合投资方式的快速创新？这样的创新又会产生什么影响？监管者需要对此密切监测，以确保市场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⁸

移动支付在中国崛起的经验表明，金融平台服

⁷金融稳定委员会，“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的市场结构：市场发展及其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2019年2月。

⁸金融稳定委员会，“ETF 近期发展趋势对金融稳定性的潜在影响”，2011年4月。

务的发展速度可以很快，在大家对它如何影响金融稳定有较深入了解前，市场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金融行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商业模式快速变化的情况，监管者需要及时做好准备。

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

杨伟民

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上海发展沙龙第 150 期 2019 年 5 月 14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沙龙的演讲马上就要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邀请了杨伟民先生为我们做演讲。杨伟民是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经担任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司长，发改委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现在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杨伟民是我们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文件、重大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参考提纲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他是 2011 年至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2 年至 2018 年历

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以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领导讲话参考提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成员、联络员，主持编制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等重要改革文件。他也是非常著名的城市研究的专家。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伟民。

杨伟民（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来上海发展沙龙，让我讲讲城市化问题。所以我就起了一个题目叫“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现在高质量发展比较时髦。其实城市化质量在十八大就提出来了。十八大的时候，我就觉得重复过去的说“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统计出来的那个城市化率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能作为一个政府工作的目标，政府的工作主要还是促进已经在城市就业的人怎么样融入这个城市。所以，后来提出“提高城市化/城镇化质量”。在十三五规划中提了两个并列指标，一个是

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一个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增长率现在是政府应该努力的目标。最近发改委在不断出文件。在今年经济形势谈会上，我说按照现在的落户进度很难完成总书记说的到2020年落户1亿人的目标，现在每年大概1300多万，五年才7000万，很难完成总书记提出的目标。

我现在用的词是城市化，但是政策文件中的用词还是城镇化。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绝大多数人是进入到城市，而不是进入到镇，实践的结果城市化，而不是城镇化。

我为什么要讲城市化的高质量呢？我觉得现在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有两个维度。提第一个维度的比较多，就是产业产品的高质量，通过科技创新等措施提高产品的质量，提高产业的质量，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但是还缺一个维度，就是空间的高质量。美丽中国现在是我们的目标了，不能山河破碎，到处劈山，到处去污染，到处去修大坝，到处乱丢垃圾。我们专门搞了高铁垃圾分类，从高铁上做起，这其实也涉及到空间。很多地方根

本无处放垃圾。估计上海比北京还要难，北京毕竟有山区可以埋，上海没有山，埋到海里去吗？所以必须要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我先是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次空间高质量发展，在日本也讲过一次。我觉得空间高质量的重点，就是城市化的高质量。空间的高质量并不仅仅是城市化的高质量，它的含义更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空间发展的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空间高质量的涵义是：符合自然属性的功能定位清晰；结构合理、开发强度适度，经济发展的空间、人的发展空间、自然生态的空间相均衡；布局合理，大尺度空间上，人口主要分布在适宜人居的空间；小尺度空间上，职住平衡，无效出行时间少；集聚经济的空间产出率高，单位面积 GDP 产出高。

首先是符合自然属性的功能定位清晰。这个地方按自然属性应该是什么功能？比如说，我们把东北的那个原来东北虎的老家划成东北虎国家公园，你让它回家，这就符合它原来的自然属性。之前砍了很多树，把老虎都赶跑了，现在老虎开始回来

了。但只是那一条线，因为过去划的就是在中俄边境的一条线，是让老虎活动范围，最窄2公里，老虎几分钟就跑过去了，那肯定是不够的，老虎没地方活动。

第二，结构合理。我觉得大的尺寸也好，小的尺寸也好，在一个空间里要有经济发展空间，有人的发展空间，有自然生态空间，这三个空间都得有。如果都是经济的空间，那就是高楼林立，没有树，没有水，这个质量肯定不好。如果没有人的发展空间，不行，这个后面具体讲。这三者之间要均衡。

第三，布局要合理，你不能把人都搬到青藏高原去，青藏高原应该是涵养水源的地方。人主要分布在适宜人居的地方，这是大的尺寸。小的尺寸，比如说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空间布局要合理，有经济的空间，有人居住的空间。为什么北京交通特别拥挤，就是因为空间布局失衡，经济和就业的空间离开居住的空间太远了，每天几百万从北京的二环路以外跑到二环路以内来上班，交通拥堵。

第四，集聚经济的空间产出质量高，这个大家

很容易理解。

我从两个方面讲，先讲讲空间发展，主要讲一些理论性的概念，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第二讲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成天说发展，也说各种各样的战略，现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有三个发展，一个是经济发展，GDP 增加，但仅仅 GDP 增加还不够，要再加上结构优化。第二是人的发展，最近几年也开始讲。第三是可持续性发展，或者是生态文明，其实生态文明并不仅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三个发展都非常正确，但你必须要落到不同的具体空间，如果失衡会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也有很多战略，比如乡村振兴，你在天安门广场能搞乡村振兴吗？不可能。你在那些空心村，包括在高山峻岭的那些村，人都没了，你振兴什么？所以必须在特定的空间，这些战略才能落地。不同空间的战略也是不一样的。东北振兴，东北的全部国土都要振兴吗？是振兴什么东西？你让黑龙江回头去搞工业，那中国的粮食就没有了，黑龙江现在提供的商品粮大概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所

以我认为，不要把地区分化都作为问题，有些分化正好是符合功能定位的。让黑龙江更多地种粮食，让青海西藏更多地生产生态产品。让那些地方怎么搞 GDP？搞不了。在这个意义上，地区分化是经济更加合理、三个空间发展更协调的一个表现，不都是坏事，所以一定要区分。若自然条件都一样，但发展有差距，那可能是有体制之差、结构之差。

我们中国有很多城市、乡村，一个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其实不应该按照行政区来讲空间发展问题，但现在大家还是按照行政区来划。我讲三个例子来说明空间发展的重要性。比如三江源、深圳、北京这三个地区，它们面临的空间发展，或者说经济发展、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要求这三个地方都同等强度地做好三个发展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三江源，它就没法发展经济。我去过黄河源头，一棵树也不长，庄稼也不能长，要想增加 GDP 就是多放牛羊，多放牛羊的结果就是沙漠化。后来中央政府拿出 60 多个亿治理三江源，第一期已经花完了。不能让它发展经济，也不能过度放牧，我去调研的时候把人都赶

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没有工作，一家给一年 8000 块钱。但这些人没有工作，早晚会有问题。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现在已经做到了，就是把三江源的 23 万平方公里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怎么解决人的问题呢？每家出一个人作为生态工人，中央政府拿钱给他开工资。我的意见是，要放一点牧，但不能把放牧作为赚钱的手段，一点不放牧也是不对的，一点不放牧牧草就疯长起来，那地方现在的问题是野生动物吃的草比放牧吃的草还要多，这也是麻烦事。要把握好这个平衡，让他放一点牧去保护生态，国家拿一部分钱，这样人的发展问题解决了。保护生态不能不考虑人的发展问题，也不能把这些人统统移出来，想要教当地人一点农耕社会的工作都是很难的。这是三江源，它的问题是，保护了生态以后，怎么去处理人的问题。

第二个，深圳。深圳的经济发展好，创新能力很强，现在应该是中国发展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问题在于人的发展，如果连人的居住问题都解决不好，你谈什么人的发展？居住是人的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深圳 2000 万人口，大概 1000 万套房

子。它有三类，一类是商品房，只占 1000 万套房子的 16%，也就是说 2000 万人去抢那 16% 的商品房。60% 的人住在城中村，一共是 600 多万套。那个城中村不像北京都是矮房子，那里的城中村都上天了。还有 20% 多是住在工厂和单位的集体宿舍。深圳一半是山，现在深圳开发 50%，没有空间再去建房子，那房价就很难降下来了。我前两三个月去过深圳，海边的房子是 13 万一平米，有多少人买得起？所以你必须得处理好房子问题，其实就是生态保护的空间和人居住的空间的矛盾。

香港也没有地方了，香港的开发强度是很低的，我记得只有 22%，大量空间是保护的，是不能开发的。我问过董建华，为什么不能填点海，为什么不能做点什么去解决房子问题？我觉未来如果深圳搞不好，一些特大城市搞不好，会变成今天的香港，未来的社会撕裂会很严重。香港现在社会撕裂其中之一就是房子问题。

深圳的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问题，是怎么解决好人的居住问题。我跟深圳人说，你就把城中村那地还给农民。因为深圳有一个很麻烦的事，它过去曾

经宣布过那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的。后来上面派调研组去了，说今后不能再说了。你不能因为宣布这个地方是城市，然后就剥夺农民的土地。所以要把地归还给农民，在那个集体土地里改造村民的房子。不符合规划的，不符合防火要求的，能不能改？你不能改，政府来给你改，照样给他地租就完了，他一分钱也不少，比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下把那些城中村的租赁房变成商品房，也可以仍旧是租赁房，功能也齐备了。现在那里的功能是不齐备的，这些城中村的防火、自来水、燃气等要差很多。

北京现在开始疏理人口，很多人不理解。北京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是水资源。北京历史上水是很多的，北京叫“淀”的地方特别多，有的村曾经是造船修船的地方，那时候水相当多。但现在北京不行了，上游都被破坏了。不是在我们这一代，是逐步被破坏的。山被破坏了，林被砍光了，水就没了。北京现在一年用水 38 亿吨。北京有两大水库，密云水库的容量 40 多亿方，官厅水库也能存 40 多亿方，但是官厅水库现在不能

用，因为被污染了。原来说 2008 年南水北调进京，后来没有实现。北京采取的一个办法，是花钱从河北把水先买回来，还有一部分靠超采地下水，超采时间长了会带来很多问题，超采到地质层时会造成地面沉降，你不清楚地面是平衡沉降还是错落式沉降，如果错落式就跟地震一样的破坏力。

上海地面沉降也很厉害，最严重的地方是在浦东，但它是比较平稳的沉降。我也知道上海已经向地下注水，解决地面沉降问题。现在你不去治理，未来地质灾害的问题很多都解决不了。如果北京像过去那样不顾一切集中功能，人就来了，水就得来，难道还要再修第二条南水北调吗？哪有水来给你修？当然北京还有其他问题。上海也有自己的空间发展问题。不同的地方问题不一样。你让中央笼统提一条，大家齐头并进去做，肯定会出问题。我们这些年出了一些问题，一刀切运动式，不考虑各地区面临的实际问题，要求得过细。

空间发展的含义是，在一定的空间，从大的概念来讲就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前沿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发展的均衡。我觉得空间发展是生态文

明意义上的发展，因为它不仅考虑经济，也不仅考虑人，同时也要考虑自然，让这三者怎么更好地平衡起来，这就是生态文明。空间发展必然引出一个概念，叫空间失衡，这是我自己创立的。假设一个国家就两个地方，东部和西部，再假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承载能力高一些。初始状态是：东部地区经济占 70%，人口占 30%；西部人口占 70%，经济占 30%。这个时候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和人口失衡，人均 GDP 差距很大。后来采取均衡发展战略，说大家 GDP 要一样，人口要一样，大家都到 50%。这个时候经济和人口是均衡了，人均 GDP 完全一样，但是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脱轨了。西部地区在要自己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上来开发，可能就意味这那个地方平地不够了，要开更多的山，城市上山、工业上山。东部地区也没有达到自己承载能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照承载能力，有多大能力就集中多少经济和集中多少人口，正确的战略应该是让西部地区在自己的承载能力上均衡地占有 40% 的经济，40% 的人口，然后东部地区占有 60% 的经济，60% 的人口。如果空

间均衡了，我觉得就是实现了空间发展，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抽象了。

日本过去也有政治平衡的问题，规划了十几个经济中心，最后实际上能成的就4个，除了三大经济圈以外，还有一个福冈，后来福冈出了污染问题，那边的工业基本上也跨掉了。日本过去曾经有过北海道开发署，现在也没了。北海道的经济和人口主要还是在札幌，其他地方没什么经济。我们现在到处都有经济中心，但我相信未来会像日本这样发展。

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三者能够均衡，特别是水土资源。土地资源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深圳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香港也是这样，多占一点郊野的公园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它就是一个法，法律可以修改。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能填海？后来说不行，香港人会反对。我说深圳那边要填海，因为挨在一起，最后的影响是一样的。香港老百姓游行可能解决不了深圳政府要填海的决心，当然现在没做。因为去年全国填海是负增长，现在搞生态环保

督察，已经不让随便填了。

我觉得未来全国每一个城市都要实现经济、人口、自然环境的空间均衡。中国城市化的高质量，我觉得要纠正四个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也是为了要纠正一些失衡问题，第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第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第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中国的空间发展我觉得也存在四大失衡。

第一个失衡，是经济和人口的失衡。人口在向城市集中，但由于户籍制度没有改，农民工就业人口来了，劳动力来了，但他的家属、老人孩子没有来，或者只有少部分人来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概各有 50 万左右农民工子弟在当地上学，当然你要都来，压力也非常大。户籍制度限制的更大后果是农民工一生少工作 20 年，也就是说四五十岁他就回去了，中国过早进入到劳动力短缺状态。现在说劳动力短缺，大家可能一般还不认帐，但我觉得很快就会劳动力短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 2011 年达到峰值，然后到 2018 年为止累计减少了 3006 万劳动年龄人口。这些人口既是劳动人

口，同时又是消费旺盛人口。现在消费下降或消费不旺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这几年减少了 3000 多万，如果这 3000 多万人在，会消费多少方便面，消费多少电视，有多少买房的刚需。

劳动年龄人口，对女性来讲就是生育旺盛的人口，现在少子化是因为生育旺盛的 20 到 29 岁的妇女人口去年比前年减少了 500 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还导致高级工短缺，还有地区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大等等，这就不多说了。美国三大都市圈的经济、人口都是比较均衡的，日本也是。中国的三大都市圈，集中的经济是 40%，但人口是 23%。劳动力过来了，但他的家属、孩子、老人没过来。要让原籍的地区负担老人的养老，负担孩子的义务教育，但他的税收是在这里交的。中国养老金现在为什么这么不平衡？上海是最早进入到养老金短缺的，后来因为外地人进来了，劳动力进来了，他们一交，马上就解决问题了。

第二是财力与人口失衡。经济和财力向大城市集中，但财政没有发挥好再分配的功能，所以地区

之间、城市之间的人均财力差距比较大。当然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我记得人均财力最高的，过去第一是上海，最近几年人均财力最高的是西藏、青海，第三是上海。财力最低的是河南。广东经济发展最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大，但人均财力排在全国二十位左右，因为上缴财政的比较多。人均财力的失衡带来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的差距。

第三是土地与人口失衡。首先是城乡之间，人在向城市集中，但农地没有放开，土地还是完全的计划，带来了农村宅基地或房子的闲置，城市居住用地的短缺。最应该关心的是城乡之间的住房问题。农村的房子如果按照一户一套（农村的房子有的比较大），每户三个人，农村现在大概接近 2.7 亿套，能住 8 亿人。但是农村现在的人口是 5.8 亿。我们老说 8 亿农民，实际上早就不是了。城镇的房子 1.98 亿套，但实际居住的人口是 8 亿人。简单说就是，农村多了 2 亿人的房子，城市少了 2 亿人房子。当然城市和城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人地失衡，还有就是一二三线城市的土地配置和人口流

动是反向的，一线城市流进的人最多，但是往往一线城市住宅用地的配置是最低的。这个不知道是地方政府确定的，还是国土资源部来决定的。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北京也好，住宅用地都很少。北京在所有一线城市中居住用地的比例是最高的。

国外一般是这样的，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比例是1比5，也就是说，工业用地有1的话，居住用地是5。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大巴黎都是这样的。北京的工业和居住是1比1.2左右，也就是说1的工业用地，有1.2的居住用地。上海是反过来的，上海的工业用地是1的话，居住用地是0.8，上海的工业用地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上海、无锡、苏州三个城市加在一起的工业用地，超过日本所有的工业用地。我记得上海整个城镇居民用地大概是660平方公里，不包括农村。北京也差不多，北京居民用地是600多平方公里，但北京没有上海人多。再一个是就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之比，就业用地包括办公、文化设施、公共设施。北京在东西城范围之内，是32比37，就是32的土地是用于居住，37的土地用于办公，东西城比二环大一点点，主要的

办公场所都在这个地区。另外更主要的是，北京上海都这样，优质公共服务基本都在老城区主城区。外面盖了很多住宅，但没有医院，学校都是农村小学。所以人住过去了以后，还要到城里来上学，导致学区房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是经济人口和资源环境失衡。刚才我讲北京其实已经超出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当然北京要解决水资源问题，除了南水北调也不是没有出路，但这个要跨整个区域来搞了，要解决好北京上游的水源问题。我问过，如果河北、山西的森林恢复到现在北京的水平，北京水平也并不太高，但你一过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就会发现河北的山好多是秃的，没钱种树，如果种树达到北京水平，那北京用水问题基本就解决了，一年能提供几十亿方的水，因为森林可以涵养水源。如果是秃山，一下雨就变成泥石流了。

还要就是北京山地比较多，老说北京为什么没有集中东京那么多人口？北京 1.64 万平方公里，日本大东京圈是 1.12 万，但北京 1 万多平方公里是山区，平原只有 6000 多平方公里，你不能把八达岭

开了去搞房子。为什么在那建长城？山高路险，你过不来，所以那是不能开发的。开发强度，天津 35%，上海 45%，无锡 32%，深圳 50%（已经到了极限了），东莞 47%，佛山 40%。日本三大都市圈平均 16%。德国斯图加特是一个小城市，20%。法国大巴黎 21%。香港我记得是 22%。

接下来我讲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途径。

第一，清晰定义城市概念。我们现在说城市，究竟说的是哪个城市，没有说清楚。我们很多政策不清晰，限房限购，是限哪个意义上的北京？北京有三个概念，一是行政区的概念，1.64 万平方公里，密云和延庆都是大山区，你限那个地方房，限那个地方车干吗？没有必要。你要限，就限主城六区。不是要让北京的人从城中心到郊区去吗，这不是你的目的吗？那个地方不要限房子了，让他到那买，你为什么限？这是不对的。

上海也是一样的，限房限车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限户籍，户籍到底限谁？应该限中心城区，不是整个区域。上海、北京整个平原面积都是 6000 多平方公里，去限它干吗？所以政策很不清晰。搞

城市化，首先你要清楚城市有三大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行政区，1.64 万平方公里，包括所有的郊区、县。当然现在京津沪已经没县了，把县搞没有了，都改成区了。荒郊野岭都变城区了，没有意义。天津蓟县主要是山区，延庆和密云都是山区。第二个概念是设区的城市，过去实际上能区分出来。北京的门头沟，因为有煤矿，虽然很远，也在山区，但它是区。通县是县，密云、延庆 50 年代修水库把这两个水库所在的县从河北划到北京来了。第三个概念是中心城区，上海我不太清楚哪些算中心城区，但北京很清楚就是城六区。这些概念我觉得一定要严格区分，我们以中心城区为政策单元可以限制户籍、汽车等，但是你说密云、延庆限什么行？没有意义。北京三环路搞公交车道完全是形式主义，有多少公交车在跑三环？画一条公交线限时，一到那个时间三环路就堵了，过了那个时候就不堵，越限越堵。这都是政策不精细。

第二，放开户籍限制。这个我觉得除了北京上海中心城区要限，其他地方未来可能都要逐步放开。最近国家发改委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了。现在这

个积分制逐步深化了。刚才讲了，现在的一个冲突就是人进城了，地进不了城，然后房子没法盖。你用现在的招投标、拍卖地的办法，来建农民买得起、租得起的房子，根本不可能。所以了，光放开户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没法买租房，他凭什么要来落户啊？现在有好多调查，这种调查我觉得意义不太大，因为你没有设计前提条件的话，他没法选择。你愿不愿意在城市落户？好多人选不愿意。你条件没给他。

第三，放开农村限制。这其实在三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鼓励集体用地入市，同权同价。后来国土部搞了 33 个试点。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什么？它没试在正地方。全国 33 个，平均一省一个，33 个试点绝大多数都不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周边。北京是在大兴，大兴的集体建设用地的卖地收入相当于 33 县的一半。为什么？只有在特大城市周边的土地才值钱。特别是土地用途，如果集体建设用地只用于搞工业，那卖不出什么价钱来。北京那块地拍出来是用于商业的。我说你让北京的商业到那去，有什么意义？他说，那干

什么？我说盖房子，给老百姓盖住宅。他说，那不是小产权吗？我说，这不是小产权，小产权是未经规划许可私自在集体用地上建房子，你这是经过规划的改革试点，经过批准的，怎么叫小产权呢？所以北京现在刚刚开始突破，在大兴一块地开始盖住宅，楼面价 3 万块。周边多少钱？8 万块。如果这么搞，新进入城市的一些农民才能买得起、租得起。当然还有一个条件是，你不给他解决首付款的问题，农民工怎么买房？

咱们大家都想想，上海可能也有 800 多万外来人口，如果这 800 万人都走了，上海能不能活下去？北京 800 万外地人口如果走了，肯定活不下去。2003 年非典的时候最典型，北京就是一个死城，因为外地人全跑了，医院的垃圾、小区的垃圾全堆着。其他的好多活动也都没有了，开出租车的也外地人，如果走不了，你就必须解决他的住房问题。所以我说昨天还讲了，我在政协讲，现在好多事你只要稍微放宽一点，经济增长就没问题。

我看了一篇文章，上海限制农民修缮和翻新住房，哪来这么些奇怪的规定？必须要住建部门去评

估说这是危房了，才能修缮。人家漏雨了，修缮一下不可以吗？还得找评估师评估完了，还要收评估费，哪来的道理？这肯定是为了自己赚钱嘛。农民的房子哪管那么多。农民的房子前面的墙下雨冲了，然后你要给我评估，评估师三天不来五天不来，还要评估费？北京也一样，现在好多农地改革试点、住宅用地改革试点搞歪了，第一个是查你有多少宅基地，让你补交款，这就不对了。不仅要严格管理，而是怎么使宅基地能够有效流转，在保持公有制基础的前提下怎么让它的使用权能够流转，让那 2 亿多闲置出来的房子和土地通过空间置换，转到城里来，变成他们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的住宅。这就是解决人的发展的问题。这个需要通过空间置换。农村多了 2 亿人的房子，占地 3000 万亩，相当于现在全国所有的 667 座城市的住宅用地，你拿出一点来，马上就解决现在的住房问题，房价不会这么高。

第四，改革住房制度。过去那一轮住房制度的改革红利已经没有了，问题开始越来越大。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当时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同

时把城市的公租房改成产权房，把产权给你。现在这些房子已经没有了，大家全变成买房子了。现在主要的矛盾在于城市少了2亿人的房子，这2亿人的房子到底怎么来？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改革住宅用地的垄断体制。这是我们从香港学的，这是很不好的体制，房价越攀越高，永远不会下来。所以必须增加供给主体，就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我这个村的地我要卖，当然你要允许他置换空间，比如说延庆的地要换到北京周边的大兴或通州，这地才能值钱，让两家去谈。政府拍那个地已经没意义了，你也别征了，以后没有必要再征农民的农田再去搞住宅，因为中国农田不够用了。

其次，改革房地产商垄断住宅的供应体制。我们过去曾经说过，中小城市、县城划出一块地允许合作建房，允许个人建房。国外很多都是这样的，你把地买来，你自己建就完了。当然在大城市不合适了。有一些县，我给他们出主意，你把地块划小，卖2亩的一小块地，价格马上抬上去。你把一大块地卖给房地产商肯定不值钱。有的地方把几十

平方公里全卖给一个开发商，变成一个高密度区，几十万人住进去。北京有一个新词叫回天地区，是回龙观、天通苑的简称，那个地区全是居住，是睡城，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在那地方居住。北京现在在改造了，增加那个地方的就业用地，因为那个地方之前全是居住用地，没有就业用地，职住严重失衡。

当然最理想的是垂直城市，一栋楼把吃喝拉撒睡都解决了，一栋楼一万人，100万人口的城市建100栋楼就够了。学校也有，游泳池也有，医院也有，饭店也有，酒店也有，所有都在一个楼里，足不出户，你没有必要去消耗能源了，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未必那么做。

还要就是租购并举，就是更多发展租赁房。过去是产权，让你买，鼓励买，现在在特大城市绝大多数人买不起。国外也是这样的，在四十岁前你想买房子，很难做到，没有积蓄没有首付怎么买？你得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能买，开始都是租房子。当然租赁的制度要建立起来，特别是租购同权。现在最没解决的问题就是落户籍，我租房到底

落哪里，因为涉及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还要出台房地产税，还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银行。这也是三中全会提的，意图也很明显。现在的五险一金，住房公积金是没有必要的，那是为了适应原来的住房制度设的。交这一金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人，真正体制外的人、农民工没有人交。如果交，企业的成本更高，因为这个金是连着工资一起涨的。如果建立一个政策性银行，你一个月存多少钱到住宅政策银行，当然住宅政策银行不是要成为一个实体银行，建行、农行、工行都可以代理它的业务，把钱存到那，买房的时候给你政策优惠。住宅政策银行的钱是哪来的？就是现在的住房公积金。这就可以把那个钱用在真正买房子的人身上。要改住房制度，必须要建立一个政策性的住宅银行。这个本来已经推的差不多了，后来又翻了，财政和银行又有点不同意见。

第五，划清空间单元。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不能像日本，也不能像美国。中国有 14 亿人，不能就三大城市群。所以现在中央政策越来越清晰地定义一个区域或一个城市群的发展，而不再简单的东

部地区、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那么大，你说它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成都重庆都很发达，但你到凉山看看什么情况。青海西藏能干什么？甘肃能做多少？做不了多少东西。新疆有资源，可以开发资源，但也不适宜搞过多的产业，因为民族特点，他的劳动习俗需要多年的改造，多年的磨合才可能。所以中央现在讲了三大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我觉得未来像成渝地区、长江中游、中原都可以聚集一亿人以上。日本有三个，中国至少有六个一亿以上的城市群。然后还有山东，辽东，哈尔滨，长春，福建沿海等都可以成为一些城市群。把这些城市空间单元划清了以后，再一个一个去规划。比如说长三角一体化，我记得大概 2003 年开了一个会，我就讲长三角一体化问题，讲长三角空间规划问题，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问题仍然是当年我说的那些问题，包括空间治理，怎么以人为本，怎么增加用地等，但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六，编制空间规划。我们现在的规划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外好多国家不编制这类规划，但很多都编制空间规划，特别是欧洲。空间规

划就是以空间发展为对象，将经济、人和资源环境综合考虑，而不是简单的讲经济发展。我们现讲大力发展这个，积极发展那个，在哪发展呢？你没说清楚。所以各地区讲，既然中央说了，我就全搞，搞完了以后过剩，浪费。

空间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城市定位，划定“三区三线三网”。“三区”是城市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类空间；“三线”是城镇开发边界、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三网”是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自然生态保护网络。

编制的方法是：县级各类规划底图叠加，消除重合板块，划定“三区三线三网”；区域级分层规划，确定自然层、网络层、各类功能区，形成一张百年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首先应编制这种一体化的空间规划。

一块地，不同部门规划成不同用途，重合的东西太多了。去年11月我在江苏讲了，长三角怎么样去编制这个空间规划？中央的规划是纲领性的，不落地。真的要实现一体化发展，你必须统筹考虑规划，然后把各个城市主要的定位说清楚。必须要

协调好，大家同意了，然后拿到全国人大，批完了以后 100 年不要变。首先你要把应该保护的山水水全划定清楚了，这叫自然层，这个是 100 年不变的。

原来我们也让京津冀编一个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最后没编成，因为指导思想不一样，脑子里想的东西不一样，不知道这空间规划应该怎么编。搞城市规划的人以建筑出身的为主，自然什么的他考虑的少，人和就业考虑得也不多。再一个，他把重点就放是控制，第一控制土地、建设用地，第二控制人口规模。人口规模不是你能控制的，然后土地是根据人口规模来的，所以那两个指标一点意义也没有。过去的城市规划老放在这两个方面有问题的。我们城市规划的问题出在哪里？老是一圈圈在扩大。真正城市内部应该怎么规划，没有搞好。最近搞得比较像样的，一个是雄安新区的规划，一个是北京副中心的规划。至少现在从图上来看，差不多每一处土地都规划清楚了。其他的城市规划都不行。国外搞得好的也有，搞得不好的也有。最近这几年城市化大发展，基本上都不按照规划。未来高质

量城市化，你必须按照规划来，不能开发商说这块地好，就建了。如果那个地正好是自然保护区，或者要建的那块地是在水源地旁边，因为那是一个全民所有的空间，你一圈变成了一个私人的属地，这是侵犯全民所有权的。如果打官司政府肯定要失败的，因为宪法规定了这些资源是全民所有的，没有一个代表全民所有的行政机关批准你的占用，你是不可以随便用的。当然这些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时间不早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如果有时间，可以提问题。

乔依德：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全面而精彩的关于城市化的报告。涉及的内容非常多，也从空间理论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思想。下面可以提题。

谢荣兴：杨主任，你好。关于城市生态链，现在首都和上海都用动迁违章建筑的方式，拆迁大批所谓的低端人口。这个就不合理了，低端劳动力没有了。靠在郊区造房子不行，那么大的距离，保姆都找不到。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杨伟民：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北京原来有 10 万

拾荒大军，现在北京垃圾处理的压力特别大，因为这些人全跑了。一个是他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原来住地下室的，现在不让住了。再一个是河北，把那些加工废弃资源的厂给关了。所以中国的再生资源也没法利用了。垃圾太多了，瓶子现在没有人捡了。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同意。未来我觉得他们会慢慢明白。大家会认识到把这些人赶走还是不行的，运垃圾、扫垃圾都得靠这些人。

左学金：谢谢杨主任。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土地用途管理，像你刚刚说的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科教用地，这个比例好像很任意。比如，房价高了，我就限购，而并不是增加住宅供地，这方面我们今后会有什么考虑？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城市的开发强度很高，但容积率又压的很低，这背后到底什么考虑？是不是因为政府拿地太便宜了？所以它可以把开发强度搞得很高，但又把容积率压得很低。现在工业园区的容积率是1，实际上每一个地块都是1，从大的范围来算只有零点几，非常浪费。而且原来的工业实际上都是服务业了，容积率还是1。现在稍微好一点了，现在

很多是2，但整个园区的容积率还是很低，这造成土地的利用非常低效。这方面我们有什么考虑吗？我说的土地用途这方面。

杨伟民：我觉得土地用途管制，未来还是要改的。有些东西要管到什么程度？你要管的主要就是基本农田，或者去管耕地变成建设用地。现在划分成那几类，制定具体的比例，我倒觉得太机械了。住建部有一套规范，一个城市有多少道路用地，道路要多宽，各级别道路要多宽，公园绿地要占多少等等，有一套比例。我倒觉得那套比例太机械，是没有必要的，应该下方给城市自己决定。

第二，刚才我没有详细说，咱们路很宽，路网很低，就是因为我们大片地出卖土地。我看美国，就是划小土地，市场价格才能高，因为每一个房子都想临街。怎么办呢？所以可能500米，一个道路就出来了，这样所有楼宇都临街了，当然路都不宽。这是市场化决定城市规划的结果，而不是说事先规划出来多少条路。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要学会做规划，必须学习怎么按照市场规律的办法去做规划，这是很重要的。我刚才说的用途管

制是必须的，因为耕地有限，20 亿亩，如果像过去那么占下去的话确实是不够用的。中国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做大量的低密度住宅，但是比现在至少可以多很多。过去我们的观念是重生产，轻生活，生产第一，消费第二，这个观念到现在一直在影响着

我们。

中国现在为什么这么被动？除了技术创新不行以外，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不重视消费，全是生产，所以给工业的地多，给生活用地不多，导致房价很高，这是长期形成的观念。所以早就成为制造大国，但一直不是消费大国。如果有足够大的市场，反制美国，一下全解决了。你手里的市场大，就可以反制他。你如果形成一个跟制造大国相匹配的消费大国、生活大国，那美国在制你的时候就得考虑了，市场在你自己手里。现在市场在他那里。你的生产和消费不成比例，这是长期的，需要一点点去改，真正在各项政策中以人民为中心。你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经济为中心？当然不是说不要 GDP，一点不要也不行。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是以就业为优先，

你有多少就业，我给你多少补助。有就业就有收入，就有 GDP 了。

谢荣兴：你是政策制定参与者。所以我建议，针对上海北京特大型城市，我们在大型的住宅建设上应该强制有低端租赁房的配套。

杨伟民：这个也不是特别好的主意。这个楼全是白领，那个楼全是蓝领的、扫大街，这不好。我觉得还是要融合。

温海龙：杨老师，最近几天我很多朋友又在探讨移民的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再往前走的话，这个国家哪些人应该是重点培养和发展的？换句话说，过去的企业家和现在的企业经营者正在走，你觉得怎样才能把他们留住？

杨伟民：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家不会走。我个人认为，最应该留的人就是企业家。现在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创新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大家把创新人才理解成为科技人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真正的创新人才，排在第一位的是企业家，第二位是科研人员。中国为什么未来有潜力？因为中国还有 10 亿人是低收入群体。

我 1986-1987 年在日本呆过一年，我发现日本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绝大多数人已经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了。我那个房东是老农民，成天老跟我吹他的地值多少钱，他就是富起来了。但中国经过四十年发展，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没有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有客观的原因。因为你的人比日本多 10 倍，你如果跟日本的发展质量、发展速度一样的话，你得比日本多 10 倍的时间才能让这 14 亿人全富起来。我觉得中国现在真正富起来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就那四亿多人，科技人员、企业家、一亿市场个体户，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医生这些人。有些个体户可能连低收入群体都算不上，靠辛辛苦苦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真正的工人和农民没有富起来。当年在日本我也打过工，他们建筑工人挣的钱比大学毕业生挣的还要多。我在上大学之前是建筑工人。北京的建筑工人现在一万多，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我问过，没有一万块钱不干。我现在的工资也一万多块钱，跟他一样，所以我的大学白上了。

乔依德：我接触很多国有企业，国企里一些职业经理人没有信心了，绑住手脚了。我现在代表

国营企业问一下，这些人以后怎么办呢？都得下海吗？

杨伟民：原来我写过调研报告，我说限薪的人要很少，当然现在扩大了。第一，董事长是党的人，代表党来经营这个资产；然后是纪委书记，代表党来监督。总经理是可以聘的。假如你现在是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可以让你选择是留在体制内，还是去体制外。留在体制内，你就等着限薪，按 0.7、0.8、0.9 的系数你拿工资。你如果不留在体制内，你可以拿市场化的工资。他不在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也可以，给大家选择权。

乔依德：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杨伟民先生的精彩演讲。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世界政治趋势与中美关系

王缉思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上海发展沙龙第 151 期 2019 年 6 月 14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博雅讲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王缉思教授。王缉思教授 1978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93 年获得学位，之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1 年到 2005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和研究员。他后来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我就不一一介绍他担任的职务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缉思教授给我们做演讲。大

家欢迎。

王缉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常感谢乔依德老师的介绍，非常感谢在座的诸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大家谈一谈我对于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

有人可能注意到我昨天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我就想介绍一下自己对国际形势总体的看法。我觉得实际上世界政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不能说清楚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新阶段。但是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上台，这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政治不一样了。

我们以前和现在经常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甚至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个提法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是很贴切的。现在和平仍然是大势，发展也的确在发展，世界经济还是以3%左右的增速往前走，不算很差。但是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不是和平的问题，也

不是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是公正、平衡和信仰的问题。现在世界经济出现的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收入分配不平均、不平衡的问题。世界范围内贫富悬殊都在加大，并且达到惊人的程度。美国人均 GDP 大概在 6 万美元左右。丹麦和卢森堡这样的国家，人均 GDP 可能在 10 万美元以上，但最穷的国家人均 GDP 可能是 1 千美元，世界贫富差距可以达到 100 倍。我们可以想一下邻国阿富汗、朝鲜和发达国家差距有多大。100 年以前，或者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和英国也有差距，但是差得了那么多吗？所以现在世界的不平衡是空前的。而且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衡也是空前的。多数国家都是越来越不平衡，有的国家基尼系数稍微低一点，比如丹麦、日本、瑞典或北欧一些国家，就连这些国家的贫富悬殊也开始加大。贫富悬殊加大，民粹主义就上升。这个我不用详细讲，大家都明白。社会不平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

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全世界现在有 2.5 亿左右的人不是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国家。大家可能觉得全世界人口 70 亿，2.5 亿人好像

没有占多大比例，但是这些人都是最活跃的人，出国的中国人也都是最活跃的人。这样移民、难民的问题都出来了。这不仅是移民、难民的问题，而是世界贫富悬殊的分界线。美国在族群、宗教信仰、种族上的问题很典型，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比较穷的白人，奥巴马和后来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往往是少数民族，也有一些妇女。美国和欧洲现在政治上的分裂往往和宗教、族群、种族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现在欧洲的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对难民、移民政策和稍微左一点的人就很不一样。

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一是贫富悬殊加大，二是社会认同的危机，也就是说你认同谁。2004年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我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我估计，如果他现在还在世，会支持特朗普这样的人——我们是白人，是基督徒，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等等。其他的那些人，当然也是美国人，但是他们没有同化得那么好，所以他们是另类。在全世界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几大现象的出现就和我要介绍的中美关系有关了。第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并相互支持。特朗普就是偏右翼的民粹主义。美国左翼的民粹主义就是占领华尔街那些人，白左、同性恋、妇女、少数权益等等，两拨民粹主义都出现了。现在右翼民粹主义占了上风，在欧洲和俄罗斯也一样。

第二，民粹民主主义上升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强人政治开始回归。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分散了，真正的强人政治也很少。但是这几年再看，日本有强人政治，虽然不那么强，但也是难得一见的，比如日本安倍首相在任那么长时间，可能是二战以后当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印度则是莫迪。阿拉伯世界，比如埃及的赛西，先是穆巴拉克被推倒，之后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我去过埃及几次，每次他们都私下跟我说，现在塞西镇压反对派更厉害了。土耳其是埃尔多安当政。其他有些国家，我就不用了，整个强人政治在回归，同时也可以说是威权主义的回归。美国人认为我们在带头搞威权主义，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不

喜欢那些词。这确实确实是全世界的一个现象，感到对西方民主制的幻灭，西方本身对民主制就有很多反思，说还怎么干下去？特别是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贫富悬殊加大以后，还能不能通过选票来表达民意，选出自己喜欢的领导人来帮助这个国家取得更好的成就？美国人就分裂了。特朗普就认为我是这样的领袖，反对派就臭骂他，这个社会就分裂了。

第三，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美国要当第一，要再次强大起来。俄罗斯、印度都想当第一，要复兴民族荣耀，要有强大的政府，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外越强硬，国内的支持越充分。奥巴马刚上来的时候说我对谁都好，我不要犯错误，对外软弱，美国可以对中国让步，对朝鲜让步，对伊朗让步。现在美国人都说奥巴马的政策是不对的，他的政策让朝鲜、俄罗斯、中国都发展起来了。所以美国现在的潮流变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战争风险都比过去有所增加。我觉得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是不大，但地区的动乱增加了，比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教派地缘冲突、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朝

鲜和美国的冲突、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乌克兰问题等等，都没有解决。世界比过去乱得多，这种乱不一定是大国之间的乱。但现在看中美之间也是比较乱的，世界整体不安宁。

第四，技术的问题。技术创新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生活，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现在炒的很热。医疗技术很强，老年人可能活的比以前更舒畅，心脏搭桥都不是困难。但是技术也可能带来负面的东西，比如美国人现在怕华为。为什么会怕呢，他们觉得如果华为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人脸识别，社会就控制在中国人手里了。全世界人拿的手机大都是安卓系统的，人心可以被政治所利用。我们当然也担心美国在各个方面威胁到我们。所以技术变成国际政治中很重要的问题，谁占领技术的突破口，谁在技术前沿，谁就是老大，谁就厉害。

第五，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在削弱。发达国家现在的问题比过去严重得多。我看到一个大家不一定注意到的数字：100年以前，白人占世界人口的25%，现在白人占比连十分之一都不到。70亿人口里，美国占3亿，欧洲占5亿，加上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其实美国人有很多人不是白人，欧洲也有很多人不是白人，白人的人口在下降。西方国家感觉很不好。当然他们内心是有一些种族主义的，但是不能公开说出来，所以它很难解决难民、移民问题。白人内心有一种恐惧感，认为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白人的主导地位变了。

这样我就回到中美关系，美国现在为什么对中国这么不友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恐惧感，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学者埃里森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出现，是因为斯巴达恐惧雅典能力的上升，它觉得雅典上升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要先发制人打它。世界上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有这么一种关系的 16 个例子里，有 12 个是打仗解决的。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和美国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差距确实是越来越小。美国人有恐惧感，他们觉得自己的老大地位不保了，大权可能被中国夺去了。我们也说过要把美国的霸权拿下去。新加坡的李显龙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个国家，想让中国人不当世界霸主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再怎么跟他说，我将来不会挑战你的，他都

不会信。这是一个霸权的视角，是政治或者权力的视角。这个视角太厉害了。比如我们跟美国人辩论，美国人说：“中国人想不想当老大？”，我们只要说：“想”。因果关系就出来了。谁不让你当老大？当然是美国了。你想当老大，不把美国推倒，怎么当老大？所以中国一定要跟美国对着干。美国人也是这套逻辑。美国人想不想当世界霸主？想。要被中国赶上怎么办？只有压制了。这个逻辑很简单却很有说服力。很多人中国也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战争解决也得想别的办法解决，最重要的是解决谁当老大问题。美国人现在对中国不满意，是因为中国引起了它的恐惧。

我认为有一点同样重要，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重要，即美国觉得中国是另类国家。你和我们不是一类的，人种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一样。在过去的时候，比如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当政的时候，美国觉得中国是会变的。中国虽然不会变得完全和美国一样，但是中国想要融入国际社会，想要搞市场经济，想

要支持国际秩序，早晚是要变的。但是中国在召开 18 大、19 大之后，特别是 2012-2013 年，美国越来越觉得中国不像要变得和他们一样，越来越觉得要分道扬镳，越来越觉得要和他们作对。美国人不仅看中国国内政治，还是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关系。美国要看中国支持谁。还有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就是中国将美国赶出亚太地区的一个抓手。

现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是美国要改变我们国内的各种政策，中国不改变就达不成协议。对特朗普来说，就是一个贸易赤字的问题。我最近和基辛格也谈过。他说他去找特朗普，想和特朗普谈一谈大的战略问题，但是他发现特朗普根本不谈战略，只谈贸易。特朗普身边还有很多人对中国不满意，不仅是贸易问题，他们也对中国国内、国际上的一系列做法不满。中国在国内、国际的所作所为，加上中国力量接近美国，引起了美国的恐惧。既有力量的问题，又有价值观的问题，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糟糕。

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他希望中国人都买美国的东西，对美国开放市场，要对等，中美之间不是权力问题，也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特别是经济利益问题。只要我们让利，美国就对我们友好。中美经贸关系被称为压舱石、推进器。现在闹什么？不就是因为钱吗？这又是一个视角。拿钱能够摆平中美的矛盾。其实有这样的想法的人也不算少，特别是直接做经贸工作的人，他们觉得美国就是要这些东西。

最后一个视角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我刚才说过，美国发生了变化，所以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美国第一”的战略就包含要和别的国家作对的意味，是别的国家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所以特朗普要把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赶回去，不让新的移民进来，改变移民政策。他认为以前的移民政策太宽松了，只要外国人进了美国就可以带家属入境。美国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的汽车在中国制造，中国人还到美国卖中国的汽车，这造成了美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国内政治现在开始朝着对中国不

利的方向发展。支持特朗普的一些人说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美国官员和我说：“中国在美国有很多非法移民，有些访问学者的家属到美国就不回来了，在那里打黑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名单。特朗普最在乎非法移民，我把这个名单给你们），你们把这些人带回国。”我们这边想要的人美国又不给，我就不说具体的人名了，就是那些捣乱的人，天天在网上骂我们的人，我们想让美方引渡回国，美方又不愿意。我们不想要的人，美方要推过来。

美国限制的对象慢慢变成了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开始乱了，刚才说的一些事都是美国国内政治混乱的表现。美国人说中国人干涉他们内政。我说：“我们总说美国人干涉我们的内政，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中国干涉美国内政了？这话从何说起呢？”美国人说：“你看，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还成立党支部了”。这个事情是有的，不能否认。中国留学生经常给使领馆汇报：“达赖喇嘛到这里来做报告了，中国不能再接受这个学校的学生到中国去访问，要停止交流”。政府管不了孔子学院，因为这是校际交流的事。当然有些孔子学院就被取

消了。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的间谍活动特别多。民主党现在骂特朗普，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太软弱。特朗普现在这样做，还被说是太软弱。他们说特朗普居然相信中国人的话，相信中国人的贸易协定，结果中国还违反了协议，所以根本不能相信中国人。民主党人开始重提新疆问题和人权问题。民主党中也有很多支持宗教自由的人，那些人批评中国政府拆基督教堂的行为。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好，中美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

权力之争、价值观之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利益之争和美国国内政治之争，这几个方面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单一的因素不会使中美关系坏到这个程度。我认为美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是质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当政的时候，美国基本上对华政策是两手：既要合作，又要斗争，或者说又要搞摩擦。但是特朗普现在基本不谈合作，美国人认为中美之间就是竞争关系。美国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官员都这么认为，觉得中美是合作关系的美国人很少。美国人在朝鲜问题

上希望中国与其合作，但是中国好像也没有和他们合作。经济问题现在闹成这样，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质变。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不是发生了质变呢？我认为还没有，我们还是坚持说没有变。刚才聊天时有人说：“习主席说过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昨天我本来想在文章里写这句话，但后来想：“现在再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我看到王毅国务委员在今年1月还在用这个说法，他说不能只看一时一事。今年5月份之前，我们的报纸和宣传一直还是不愿意说美国坏话的，直到最近才开始放“上甘岭”等等。可是美国早就发生变化了。去年10月4日，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全面攻击中国。但是中国还是想尽量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合作、协调，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基调。中国还要想办法回应美国对我们的压力，所以中国现在还是要变化，但变化是要有分寸的。我引用“斗而不破”这句话，我们还是要谈，不能说因为两国关系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两国元首也不相见，两国高级官员也不打交道，我们还得打交道。

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对短期内的中美关系是不乐观，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越来越坏。最近又出现了留学生问题，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新问题。之前出现华为的问题，华为本来已经被弄到风口浪尖了，贸易一没谈成，华为就出了事情，以后还会出现很多事情。美国还是有一些对华手段的。我们研究政策的人本来有一个期待：如果中美能够达成贸易协定，关系缓和一下，特朗普就不去干那些坏事了，我们就找一个机遇再把他往上抬一抬。但是现在没有贸易协定了。特朗普想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所以他就说：“不要提问题、南海问题和人权问题，等我把贸易协定谈成再提”。但贸易协定没有办法谈成，他还能不能把这些都压住？美国多的是反华分子，他们如果要和中国作对，他们会一个一个出牌的。一旦贸易协定谈不成，“牛鬼蛇神”又会跳出来和中国作对。这时候，中国有没有预案？比如有没有关于台湾派高级官员去美国、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或者南海、新疆问题的预案？我们需要有思想准备。

从长远来看，我对中美关系还不是那么悲观。

原因是两个大国还是有很多的共同利益。美国公司真的能离开上海到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或柬埔寨吗？这些国家加起来能吸收美国多少资金？中美经贸关系还是很重要的，美国公司从中国完全撤走资金和人没有那么容易。这些美国公司的老板现在给特朗普写信说：“不能再这么做，再这么干坏事，我们都要受损失”。所以我认为贸易战打到一定程度，打到双方都有损失的时候就会回转。但是现在贸易战才刚刚开始，这个压力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已经有很多人预感到要受损失，他们的心理上承受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认识的很多对华友好的美国人现在不出来说话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的反华情绪很严重。现在这些人很担心损害到他们自己。他们说那些和中国打交道的人都上了中国人的当，他们都是“熊猫拥抱者”，这和我们说的投降派意思差不多，是很难听的话。所以现在对华友好的人都藏起来了，他们会偷偷地来，但是不会公开去发表对华友好的文章。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恐怕就会出来说话。我表扬了一下我

的老朋友，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世界是平的》。他认为现在情况很不好，建议中美两国领导人到新加坡去开会，由李显龙出面调节一下。不能再闹了，再这么闹下去，整个世界就会分裂，经济、技术、互联网都会分裂。所以美国人早晚会有一些人出来说话，日本人现在也开始投机取巧，讨好中国说他们也愿意考虑一带一路。在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出来说一点好听的话。有些人认为他们肯定要站在美国那一边和中国作对。我不这么认为。他们是脚踏两只船，主要要看是什么情况、哪件事。英国可能和中国达成某种协议，但是加拿大就不会愿意。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美国，一半是中国，这个情况可能也不现实。

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说，中美关系还是会变。我觉得中国也会变。但是中国会往哪个方向变，我作为普通人也说不出来。但是我相信年轻人。年轻一代有新的思想，有新的做法，他们也会越变越好。美国现在这样一种民粹主义、社会分裂的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有变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

对华政策也许会 and 现在不一样。或者也有可能他没有第二任期，会有一拨新的人和我们打交道。所以世界是变化的。我不是非常悲观。我不认为中美必然要发生冲突，要打起来，要变成长久的战略对手。现在美国是把中国看成长久的对手了，但是也许过两三年，他会说中国是主要的对手，再过几年，美国也许还会说中美有共同的利益，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中美关系不至于那么坏。我们会有一些理想情绪，不甘心研究美国那么多年，研究到最后中美关系坏成这样。

中国做的一些事情还是留有余地的。我们可以用稀土问题吓唬美国一下，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真的那么做，后果是什么。真的这么做，美国可能又要报复中国，形成螺旋形的互相报复，就无休止了。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有所控制的，或者说我们还是有理有据有节的。美国方面也没有走到和中国完全对立的程度。我最近听说的一件事是：今年6月初的敏感日期，美国副总统彭斯要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他要和中国作对，后来美国就换成国务卿发表对华讲话了。所以我们也有一种猜测，美国方

面可能想副总统公开表示反对中国，恐怕有点太过分了，以后还要和中国打交道。总而言之，双方多少还是留点面子给彼此。习主席出访俄罗斯时说：“特朗普是我的朋友”。特朗普也一直在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互称朋友，两国关系还是有点希望的，我们不是要撕破脸。问题在于两国元首说的那些话，美国不一定听。美国政府的中下层官员换了很多。我今天到复旦大学，复旦的人说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到这里来了，现在下台了。对中国稍微温和一点的人靠边站，温和派要么到越南当大使，要么就不知道是什么职务。那些投机的人，骂中国骂的比较多的人职位就上升了。我在想这样的情况会好转吗？我认为时间长了以后，那些对中国友好的人你还是要被启用的。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中美关系也不至于那么悲观。我们的经济发展好，信心还是比较足。中国手里有很多牌可以打，不至于惊慌失措。总有一些美国人盼着中国人越来越不好，我们心里应该有数，中国还是行的。演讲就此结束吧，希望大家多提

意见。

乔依德：非常感谢王教授精彩的演讲。他用清楚直白的语言，讲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交流。

赵广彬：谢谢你，演讲很精彩。你刚才讲，近期之内，包括在 G20 峰会上，你觉得不太可能达成协议。从贸易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议？

王缉思：我不是经贸问题的专家。从政治上来看，这一次谈判没有达成双方想达成的协议，双方应该都会沉寂一段时间。我们再按照这个基础重新谈的可能性很小。有人判断双方最少沉寂几个月的时间。等到贸易战也打过了，双方重新计算损失和利益，这时候有可能再达成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在近期内，比如两三个月内，我觉得很不可能。我认为最少要到今年年底，才能有一个新的协定，要看整体政治形势怎么样。中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也有自己的考虑。现在没有谈成协议，美国说是因为中国出尔反尔，中国说是因为美国出尔反尔。本来已

经有可能谈成协议，因为双方各自的国内的考虑，就要搁置。搁置多长时间？这个就很难说。我觉得不会只搁置两三个星期，不会是元首们在大阪见一面，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情况，开始第 12 轮谈判，马上达成协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小了。但是这不等于以前的全部都是白谈，不等于前面 11 轮都没有成果，因为毕竟费了那么多的力气。中国会提出来，要接着谈判美国就要取消关税。美国人说，你如果不接受我的这些条件，就要加关税。这就是一个僵局，也很难解决。我认为这里的经贸问题、实际利益问题不是首要决定因素，首要的因素是双方国内政治的一种考虑，这里面也有面子问题。双方在面子上要做一些努力才能谈回原来的协议。

左学金：王先生，你对中美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信心。我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郑永年写文章说中美正在发生新冷战，他判断世界会形成两个体系，美国带着欧洲日本，中国带着部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形成两个体系。你对这种判断持怎样的看法？第二个问题，中美关系形成今天的局面是我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习主席在俄罗斯也

表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外交或舆论宣传的角度，现在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王缉思：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研究者对美国的判断出现失误，也会受到批评。比如大家开始都觉得特朗普当不了总统，但是特朗普当选了。当选以后，又有人说：“他是商人出身，不会闹大事的，他比民主党好”。这个判断也不对。现在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好好研究美国，包括上海的研究者要分不同的课题研究美国，现在正在做这个。如果说反思的话，从研究者的角度就是可能过去太急于求成，或者说把中美关系理想化了。我们跟美国人谈的时候，就是只想怎么能够达成协议，觉得中美贸易协定达成以后，中美关系就会有转机。我一直反对这个想法。我刚才说了，美国对华政策是一整个框架，即使贸易谈判成功，中美关系也不那么理想。因为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会执行，美国要监督中国怎么执行。中国答应改的内容不可能马上就改，这样的话美国就要天天给中国捣乱，会炒作本来和贸易无关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一带一路问题。我们的判断偏乐观的一个原因是中国

希望都按照我们所设定的道路走，不敢说这个设定的道路是不对的，但是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能对应。我们对现在这个情况的思想准备不够，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关于世界会不会分成两半这个问题，我也正在做这个课题。我想召集一些懂技术的人来讨论，5G技术是不是能把世界分成两半？人工智或者说中国的技术，有没有发展到和美国脱钩的程度？我听到几个美国人斩钉截铁的说，我们希望脱钩。他们认为中国在很多地方依赖美国的技术，美国依赖中国技术的地方很少，所以脱钩对中国不利，对美国没有多少不利。当然也有人说要在经济上脱钩，我们卖给美国的东西多，美国卖给我们的东西少。但这个声音不那么强大，因为美国太多的公司、企业和个人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技术和经济不完全是一码事。技术专家的意见不一致，经济问题的专家也不一致。有的人说：“我们可以不依靠美国市场，可以找别的市场”，这很难。有人提到我们不买美国大豆，可以买阿根廷的、巴西的，但是这些国家大豆的价格很贵，一下也买不出那么多。

很多技术经济的细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总体来说，我认为不应该脱钩。我们已经融入世界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世界突然变成两半，而且我们这个世界比他们那个世界小很多、落后很多，是对我们不利的。中国找那些穷哥们儿，他们能给中国提供什么东西？把整个非洲都攥在手里，中国能得到什么？所以我觉得脱钩对我们是不利的。既然是不利的，我们是不是要把想办法排除脱钩？如果我们和美国脱钩，就会发生新冷战。我认为出现新冷战其实很容易，或者说想把中美关系搞坏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搞坏它。因为美国本来对中国就不好。中国如果还说就是这样了，美国和中国是战略敌人，那么中美关系肯定不会缓和。如果说从 1949 年开始，美国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战略敌人。如果这么说，后面还怎么做？没有办法做了。所以我不赞成把世界分成两半。可是美国人想那么做。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世界分成两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性比较小。世界曾经分成两半的时候，比如冷战时期，苏联找它的小伙伴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美国组建关税贸易总协定、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其实我们在这个体系里是沾光的。现在有人要中国从这里走出来，自己带一拨人组建另外一套体系，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走这条道路，而不是美国这么一说，我们就真的相信世界能够变成两半。

高宏：王老师你好，你讲所有乱象的根就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它们抬头的的原因又是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各个国家国内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么我想问一下，贫富差距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王缉思：我曾经考虑过这方面问题。我在写书的时候也写到过，历史上有三个办法缩小贫富悬殊差距：第一个是打仗，打完仗之后，贫富差距就会变小，比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过后大家都很穷。另外一种方式是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家都变穷了，地主也没有钱了，穷棒子也没有一下子翻过身，大家都穷。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但是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发

生过。只要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贫富差距就会加大。世界上曾经还有一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就是瘟疫，传染病、黑死病传播，人都死了还怎么发展？这些方式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剩下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政府方式协调。多收一点税做社会福利，这就是北欧的做法。相对来说，北欧平均富裕的程度高一点。但是这种方法在别的国家行不通。我们的扶贫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是很正确的一条思路，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会成功的，可是不能永远都在扶贫，贫困不仅是给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应该更好地起到协调作用，通过税收、扶贫等方式缩减贫富差距。但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在和平时期，政府相对来说都是偏向富人的，不是偏向穷人的。政府在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会偏向穷人，一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政治就会变成金钱政治，政治家会被收买。美国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典型的金钱政治，官员被华尔街的人养起来了，这也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点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往往虚拟经济发展得很快，美国现在开始反思制造

业的落后。制造业落后导致中国人赚走了钱。中国人把钱赚走之后回到美国的金融市场，买美国的债券。有人问：“为什么不能把买美国债券的这些人拿到中国来扶贫”？经济学家会笑话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现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国民不满意政府，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中东、摩洛哥、埃及的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不闹事怎么生活？当然要闹事。很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苗头，民众要和政府闹。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乱、难民潮，大规模的战乱一旦发生会相互传染。世界政治的新趋势就是乱。世界混乱以后，各个国家的维稳支出大大增加。前几年世界没有这么乱。香港也没有这么乱。香港乱也和贫富差距加大有关，和很多人找不到职业有关。这个问题很严重。闹事可以找理由、找借口。全世界有很多人心心里不安，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饭吃。

缪其浩：我确实很同意当前世界的情况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关。有人认为我们更多地要看消费差距而非贫富差距。如果你有天大的财富，但消费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你只是名义上占有

它。一些有钱人是最聪明、最能干、天赋能力最强的人，他们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你总不能消灭他们，但是可以通过拉低消费差距来达到平衡。而且有数据显示消费差距并不像财富差距一样在扩大，消费差距可能在缩小，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王缉思：我不是经济问题的专家。但是现在技术水平提高，或者说互联网+以后，贫富差距加大给人的感觉就更明显。穷人过去不知道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原来百姓在穷乡僻壤不出门，他们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农民工进城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情况封不住了，我们不能让那些人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想事情。你给人灌输只要用心劳动就能致富的思想，但是这怎么可能呢？送外卖的人，一天多送十几次，也富不起来。另外，技术越先进，需要的人力就越少。将来无人操作的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会越来越多，体力劳动者失业的就会更多，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现在想让他们进行职业再培训，让他们再学习文化、技术，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基础教育不会一下提升。这也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资源不平等、医疗卫生不平等，这些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有人说刺激消费。我们现在也是在找各种办法，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如果社会保障不能保证，民众有钱也不敢花。为什么？将来身体不好了怎么办？或者子女、孙辈上学怎么办？社会保障的钱从哪里出？采取全民社保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美国现在走的这条路，我们以后是不能走的。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路。共和党认为想要富，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刺激这些有钱人，让他们有经济自由，让他们去发家致富，给他们一点小的好处，把机会一点点给他们。民主党的想法是通过全民医保来解决问题。全民医保政策本来是好事，没有想到结果是穷人的医疗费用也提升了。很多人本来不用支出那么多，但是实行全民医保之后，他们支出的费用比过去更多。所以这样的问题真是太难解决。我想不出办法，因为我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随便说几句。

王红林：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现在我发现工作越来越难做，中美之间好多时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但是我们研究经济的人总想找一个框架，没有框架就不好研究。所以我想请教王教授，中美关系有没有一个研究的框架。我有一个非常粗浅的想法，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前提：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有没有确立下来，还会不会改变？这个事情确定下来之后，中国就有两个应对方式，一是软，二是硬。两年前我碰到郑永年，我问他：“中国应该怎么办”？他就说了四个字：“越软越好”。另外，就是硬，就是有人说的“上甘岭”。所谓“上甘岭”就是双方都不甘心在谈判桌上签字，最后就打到上甘岭，我打不动你，你也打不动我，双方就到谈判桌上签字。我认为如果美国确定了全面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中国软的后果就是会被美国掐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遏制中国的想法改变，也许中国和美国之间还会有一段长期的合作。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缉思：我做政治学研究也想找出一个理论框架。我刚才大体已经有一个框架，即中美之间必有

一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但是他更害怕的是一个和美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都不一样的中国强大起来。中美要缓和下来，有四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美国实在不行了，特朗普站不住脚了，或者特朗普的身体出了问题，政治出了问题，美国变得一团糟，这样就没有工夫来骚扰中国了。第二个可能是国际一团糟，俄罗斯、朝鲜或伊朗打美国，美国又发生一次 911 事件，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样美国就没有心思来搞中国，它甚至会和中国合作，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个可能性很小。还有一个可能是中国经济下滑，那么美国人就会想：“现在中国经济增速只有 4%，我还有 3%，中国离追上我还远那早着呢，不必着急”。这样美国慢慢就软下来了。但我也并不想中国的经济增速落到 4%。我们希望 6% 的增速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说 2027 年经济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说我们很快就超过美国了。美国增速平均起来总是 2%-3%。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话，美国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那么可怕，中国不会立刻追上美国。但是美国一直有一个心

理，就是他们总觉得美国在衰落，我们在崛起。美国人和我们正好相反，他们愿意唱衰自己，说：“美国不行了，中国厉害得不得了”。美国人说这个话并不是真的认为我们很厉害，而是要凝聚民心。他们对民众说：“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手来了，过去是苏联，后来是伊斯兰世界”，美国政府把本拉登吹嘘的很厉害，又是说基地组织要怎么样，又是说伊斯兰国。美国总倾向于夸大对手。北朝鲜的力量能有多大？美国人一定要说朝鲜人马上就要打到美国本土了。他们总会拼命地说对手很强大。中国人就拼命地说对手不行，我们很强大。我们说：“我们的这套路线绝对不能变”，美国就说：“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变，前几年我们看错了你们，我们以为你们能变，但是你们不但不变，而且变得我们更加不喜欢了”。这里面还是有调整的余地。比如我们如果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要改变国内的一些做法，至少从经济上有一些改变。

乔依德：好的，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